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中国育龄 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

陈茜¹ 董芳香¹ 陈翠香²

(¹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家庭化温馨产房; ²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门诊急诊, 济宁 272000)

摘要 在中国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与实际行为普遍存在偏离,这一现象已成为影响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计划行为理论(TPB)为理解这种偏离提供了系统框架,指出生育决策由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共同影响,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是发展焦虑、支持体系缺位与文化价值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建议通过政策理念赋能、构建支持网络、创新治理模式等进一步完善系统性生育支持体系,建立积极的生育态度,重塑包容的生育规范,增强生育感知行为控制,以缩小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

关键词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偏离;育龄女性;计划行为理论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0-9760(2026)02-063-05

Deviation of fertility desire and behavior of childbearing age women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CHEN Xi¹, DONG Fangxiang¹, CHEN Cuixiang²

(¹ Family-friendly Delivery Room, ²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Outpatient and Emergenc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272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China's low fertility rat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fertility desire and actual fertility behavior among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constituting a critical issue impacting the sustainabl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offers a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is discrepancy, indicating that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is jointly influenced by fertility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The fertility deviation among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of China results from developmental anxiety, insufficient support systems, and cultural value shifts.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systematic fertility support infrastructure, foster positive fertility attitudes, reshape inclusive fertility norms, and strengthen fertility perception control through policy empowerment, support network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model innovations, thereby reducing the gap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behaviors among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Keywords: Fertility desire; Fertility behavior; Deviation; Childbearing age women; Planned behavior

当前我国育龄女性存在一定程度的“生育偏离”。这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偏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育龄女性所面临的生育困境与健康不平等。因此,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开展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低生育率现象的核心,更有利于促进生育支持政策制定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为视角,系统梳理了关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现状及背后动因,旨在为今后提高对育龄女性生育困境的精准评估、促进医院及社区高质量生殖健康护理、构建有效生育支持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1 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女性生育偏离现象

1.1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现实挑战

人口增长对于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当前许多国家已经步入了后生育转变阶段,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等严峻挑战^[1-2]。其中,中国人口增长问题尤为突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正式步入了低生育率阶段,尽管目前我国的生育政策已全面放开,并在 2015 年与 2021 年相继推出了二孩和三孩政策,但少子化、老龄化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仍然是制约我国人口长远发展的严峻挑战。

1.2 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整体态势

中国的人口发展正面临“低生育率”的现实风险^[3],但这种生育水平的降低并不能代表中国群众生育意愿的下降:多项全国性调查^[4-5]指出,近几年中国人口的平均生育意愿并没有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现阶段我国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仍维持在 1.8~2.1,这表明当前我国育龄女性存在一定程度的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

当前中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可从数量、时间、性别等多个维度上进行捕捉:1)数量维度。主要表现为意向子女数与实际子女数的不平等,即意愿子女数大于或小于实际子女数。研究^[6-7]指出,我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数量整体呈现“意愿子女数>实际子女数”的递变趋势。2022 年中国计生协开展的中国婚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8]则明确指出,当前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89 个,平均实际子女数为 1.19 个,未实现的生育意愿约 0.7 个,表明当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完全转变仍受到多方面的阻碍。2)时间维度。主要表现为理想生育时间或生育间隔与实际生育时间或间隔的偏离,包括初育年龄的推迟或提前和生育间隔的延长或缩短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育龄女性实际初育年龄高于理想初育年龄^[9],生育间隔则呈现由缩短到延长再到缩短的趋势变化^[10]。3)性别维度。主要表现为理想子女偏好与实际子女性别结构的不一致。尽管当前育龄女性的生育性别结构的偏好整体呈现出由有偏好向无偏好转变,但目前男孩与女孩的偏好弱化趋势并不同步^[11],目前仍有约 60% 青年女性的理想子女性别与实际子女性别存在偏离^[12]。

1.3 本文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生育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行为,而是个体或家庭在平衡多种内外在

因素后的理性决策。众所周知,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转变往往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决策变化,随着妇女所处育龄期的变化,二者可能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偏离^[13]。这种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形成机制可以通过 TPB 视角进行解读^[14-15]。本文以 TPB 为分析框架,旨在从文化环境、社会支持、个体心理等方面系统分析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相关因素,从微观层面架构中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偏离的理论框架,为今后构建有效的生育支持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及方法学借鉴。

2 生育决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TPB 解释框架

TPB 最早由 Ajzen 于 1985 年提出,主要解释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感知、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结果 5 个变量间的关系(见图 1)^[16]。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和结果受到人的内在认知影响,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是预测和解释行为意图与结果差异的重要因素。作为解释意愿与行为的主导理论框架,TPB 在生育研究中的稳健性已得到有效验证^[8]。该理论指出,个体的生育意愿可以直接影响其生育决策,而个体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生育意愿亦有直接影响。因此,根据 TPB,我们可将导致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纳为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 3 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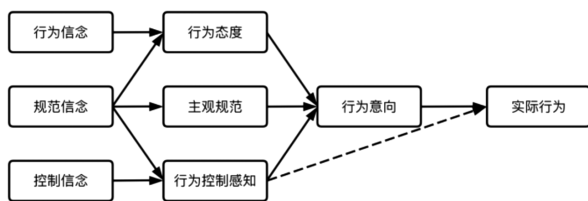


图 1 TPB 模型框架

2.2 生育态度的代际演变

生育态度是指个体或家庭对生育的总体看法及行为意图,涵盖了个人对生育的认知、情感与意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个体的生育动机^[17]及生育价值观^[18]。作为预测已婚妇女生育意愿的最强预测因素^[19],生育态度受到文化观念、社会资本、家庭结构、舆论信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生育文化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从 60、70 年代的“多子多福”“养儿防

老”转变为 90、00 年代的“性别无差异”“优生优生”，中国育龄女性对生育的态度已由传统的“家庭责任”“必然选择”转变为以个体情感满足与自我实现为主导的“幸福体验”“个体化选择”。这种生育态度的代际演变表明，对于育龄女性而言，生育已不再是个体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及义务，而是一种遵循内心动机的自我选择。这不仅体现了当代育龄女性生育价值观的转变，也反映了社会结构性因素带来的潜在影响：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传统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正日渐弱化，育龄女性对生育的价值判断标准正从家族延续转向个人情感需求与社会价值的提升。

2.3 主观规范的现代重塑压力

生育主观规范主要是指个体在进行生育决策及行为时所感知到的来自社会、父母、朋友等方面的情境压力，常受到传统观念、社会礼俗、舆论规范等的影响，是生育相关压力的内在体现^[20]。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结构与文化理念的转变，传统婚育观念正逐渐淡化而“婚育分离”“丁克家庭”等新型生育规范正悄然兴起。这种传统社会期望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得育龄女性的生育主观规范环境正经历着由社会家族导向过渡为个人动机指引，从性别不平等转向性别平等，从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包容的现代重塑。但同时，这种重塑也面临着生育期望的代际差异、同辈生育经历参照效应和社交媒体生育信息双重涵化等多重压力影响。

2.4 行为控制感知的结构性成因

生育感知行为控制主要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顺利完成生育行为的主观感受，与经济、家庭、社区及政府支持等外部环境因素联系密切^[21]。既往研究指出，经济压力是制约中国育龄女性生育的首要原因，在对育龄人群的调研中，约 58.07% 的人生育意愿低是源于个体收入不足。此外，工作-家庭冲突也是当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原因^[22]。尽管政府已修订和出台了相关生育支持政策，但生育期间收入水平的下降、生育导致的职业晋升影响、家庭支持不足等带来的生育惩罚效应仍是影响女性生育行为控制感知的重要结构性成因。

3 生育偏离形成的系统动因

3.1 发展焦虑引致的生育推迟

发展焦虑主要指个体对自身职业前景、生活品质、社会地位等未来发展情况的担忧。随着经济的

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加速变迁，个人发展面临着物质压力、技术革新、社会期待和个人价值实现等多重挑战，而育龄女性作为青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育行为与职业发展往往存在较大的资源竞争。这种来源于职业发展、经济压力与个人实现等多重维度的发展焦虑是当代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下降及生育延迟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育儿所带来的经济资源下降、时间精力的下降等也是女性推迟和拒绝生育的重要因素^[23]。研究^[17]指出，随着生育成本的增加，当前女性的生育意愿正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3.2 支持体系缺位的挤出效应

生育作为关系到个体或家庭长期发展的重要决策，受多种内外在因素的影响。职业稳定、经济良好、发展前景可期是实现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前提，而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是实现以上条件的重要途径。目前，支持体系缺位产生的挤出效应是中国育龄女性生育偏离现象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缺位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家庭支持与制度保障 3 个方面：1)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西方国家相比，目前我国 0~3 岁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仍存在结构性短缺，这种缺位不仅增加了当前育龄女性的家庭育儿负担，也无形中提高了育儿成本，导致女性生育意愿的降低。2) 家庭支持系统的失衡。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劳动参与率在不断提升，但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仍积重难返，“丧偶式育儿”模式正不断加重育龄女性的身心负担，这种家庭支持系统的失衡严重降低了女性生育体验的幸福感，加剧了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3) 制度保障不完善。尽管当前国内不断推出产假延长、明确育儿假、给予育儿补贴等支持政策，但目前政策执行的效果与预期尚存在较大差距。配套监管措施的缺失、妇幼健康服务区域不均衡、高龄产妇津贴福利、工作就业等方面的保障不完善等都是女性生育顾虑的重要来源。

3.3 文化价值变迁的深层影响

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当前中国文化更加包容与多元化，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与个体意识的增强，使得越来越多育龄女性在进行生育决策时更多的是考虑自我价值而非社会责任，同时“丁克家庭”的流行也使越来越多女性不再将生育作为个人价值的唯一实现途径。性别观念的现代化、家庭观念的个体化和幸福观念的多元化转变为育龄女

性的生育选择提供了更为宽泛的选择范围和更加包容的社会环境。2023 年人民智库对 2318 位中国育龄人群的调查^[23]结果显示,目前约 44.26% 的育龄人群支持“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而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认同度呈下降趋势。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生育不应是对女性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及义务”“女性有不生育的自由”。

4 构建生育支持体系的关键路径

4.1 政策理念的赋能导向

生育政策的变化是育龄女性进行生育决策和感知行为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政策引导和社会支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可以促进家庭幸福和社会,更有利于未来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因此,未来应围绕育龄女性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生育相关支持政策,如增加生育津贴、购房补贴,简化生育保险报销流程,推动生育阶段女性工作场所及时间灵活性安排,制定和完善育儿假制度等,从单纯鼓励生育转向全面赋能,以有效缓解育龄女性当前面临的生育相关发展焦虑,破解我国“低生育率”的生育困境。

4.2 支持网络的多方共建

推动生育支持体系的落地见效,离不开积极的宣传引导,尤其是在网络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全面塑造育龄女性积极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尤为重要。因此,在未来,应突破传统政府主导的单一宣传模式,借助政府、市场、社区与家庭等多元主体优势,进一步完善育龄女性的生育教育,加强对育龄女性生育观的教育与引导,将生育观念由传统的“社会责任”转变为“幸福导向”和“人生价值”,重塑积极的生育文化,于潜移默化中提升个人及家庭的生育意愿。

4.3 治理模式的协同创新

财务、教育、工作等现实问题是制约育龄女性生育意向的重要原因,因此,推进财务、税收、保险、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多方面政策组合,实施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协同优化管理是保障生育支持政策落地的有效途径。在未来,建议地方政府应有效整合教育、医疗、就业、税收等领域资源,切实开展围绕生育全过程的连续服务支持,包括加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孕产幼儿健康服务,如拓展婴幼儿医保范围、加大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等民生项目的实施力度,将托育服

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等,搭建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切实减轻育龄女性在生育、养育及教育子女方面的负担,从外在环境方面化解育龄女性的生育阻碍。

5 结论与展望

综上可知,当前我国育龄女性存在一定程度的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这种偏离现象反映了当前育龄女性所面临的生育困境与健康不平等。从 TPB 视角看,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受到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生育观念的重塑、家庭经济负担、职业发展制约、时间精力不足和教育成本高是导致我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未实现的主要原因,而加强生育政策的赋能导向、借助网络多方共建育龄女性的生育文化、实施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协同优化管理将是未来有效推进和保障生育支持政策落地的有效途径。

此外,中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离不开微观个体态度、中观社会规范和宏观政策环境的共同作用,因此,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背后的成因机制尚需要深入研究,基于现有研究局限和知识空白,未来研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向进一步深化:1)加强对育龄女性生育决策的追踪研究,特别是从生命周期视角追踪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动态变化过程;2)探索信息技术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包括社交媒体、网络舆论等对育龄女性生育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3)关注区域差异对生育偏离的影响,探索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社会政策差异对生育意愿与行为转化的影响;4)加强政策评估研究,通过严谨的实证方法评估各类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为政策优化、构建有效的生育支持体系提供更加坚实的数据支撑。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闵慧祖,王海英,杨田.低生育率背景下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机遇、挑战与应对[J].教育发展研究,2023,43(12):2532.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3.12.010.
- [2]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危机与应对[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6(5):69-76.
- [3] Master F. China's population drops for second year, with record low birth rate[N]. London:Reuters,2024-01-17.
- [4]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

- 答记者问[EB/OL]. (2021-05-11) [2025-10-31]. https://www.stats.gov.cn/sj/sjd/202302/t20230202_1896483.html.
- [5]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 年数据[DB/OL]. (2019) [2025-10-05]. <http://cnsda.ruc.edu.cn/>.
- [6] 张冲, 李想. 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J]. 中国卫生统计, 2020, 37(6): 902-904, 907. DOI: 10. 3969/j. issn. 1002-3674. 06. 026.
- [7] 贾志科, 罗志华, 风笑天. 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南京、保定调查的实证分析[J]. 西北人口, 2019, 40(5): 69-79. DOI: 10. 15884/j. cnki. issn. 1007-0672. 2019. 05. 007.
- [8] 齐嘉楠, 贺丹. 未实现生育意愿的构成及成因——基于 2022 年中国婚育状况调查[J]. 人口与社会, 2025, 41(5): 55-66. DOI: 10. 14132/j. 2095-7963. 2025. 05. 005.
- [9] 张银锋, 侯佳伟. 中国人口实际与理想的生育年龄: 1994-2012[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2): 2-11. DOI: 10. 3969/j. issn. 1674-1668. 2016. 02. 001.
- [10] 张翠玲, 刘鸿雁, 王英安. 生育间隔政策对我国二孩生育时机及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19, 25(4): 11-22.
- [11] 侯佳伟, 顾宝昌, 张银锋. 子女偏好与出生性别比的动态关系: 1979—2017[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0): 86-101, 206.
- [12] 贾志科, 罗志华.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J]. 中国人口科学, 2024, 38(2): 66-81.
- [13] Miller WB. Childbearing motivations, desires, and intentio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J]. Genet Soc Gen Psychol Monogr, 1994, 120(2): 223-258.
- [14] 梁英, 赵何钧, 赵宝旭, 等.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预测生育意愿: 一项三水平元分析[J/OL]. 心理科学进展, 33(11): 1926-1941. [2025-10-05].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5.1926>.
- [15] 刘会兰.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女性生育意愿研究[J]. 科学咨询, 2025(16): 221-224.
- [16] Ajzen 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Kuhl J, Beckmann J. Action-control: from cognition to behavior.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5: 11-39.
- [17] 宋健, 胡波.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J]. 人口与经济, 2022(6): 1-16. DOI: 10. 3969/j. issn. 1000-4149. 2022. 00. 052.
- [18] 盛禾, 李建新. 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分析基于 CF-PS2020 数据[J]. 社会, 2023, 43(3): 187-212. DOI: 10. 3969/j. issn. 1004-8804. 2023. 03. 007.
- [19] Ghasemi J, Safizadeh M, Khajeh Z, et al. Immediate antecedents of intentions for having children in southeast Iranian women[J]. Korean J Fam Med, 2023, 44(5): 289-294. DOI: 10. 4082/kjfm. 23. 0048.
- [20] 陈思静, 沈家辉, 姜侨桀, 等. 对他人生育态度和行为的低估抑制了 Z 世代未生育个体的生育意愿[J]. 心理学报, 2024, 56(6): 759-779. DOI: 10. 3724/SPJ. 1041. 2024. 00759.
- [21] 姜茂敏. 我国生育率水平多因素驱动效应与提升路径[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11): 81-85. DOI: 10. 13546/j. cnki. tjyj. 2024. 11. 014.
- [22] 于光齐. 工作-家庭冲突对育龄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影响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3.
- [23] 石晶. 中国公众生育观念调查报告(2023)[J]. 国家治理, 2023(9): 70-74. DOI: 10. 16619/j. cnki. cn10-1264/d. 2023. 09. 012.

(收稿日期 2025-10-31)

(本文编辑:石俊强)